

税收分享与县域经济增长

张冠甲¹, 刘维刚², 李军林³

(1.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 北京 100028;

3.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在我国现行财政分权制度下,省级政府与中央就共享税种税收收入的分成办法早已确立,但是,对于处于基层的县级政府如何与上级政府进行分成,并无统一的法规规定。通过 2002—2007 年全国县级财政税收收入面板数据,测算出县级政府和上级政府间在共享税种税收收入上的实际分享比例,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分享比例的变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若共享税种税收收入中,县级政府所分享比例提高,可有效刺激县域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共享税分享规则对地方经济的刺激效应,以促进地方优化经济增长的方式。

[关键词]税收分享; 征税努力; 公共支出; 县域经济增长; 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7)04-0098-07

DOI:10.15981/j.cnki.dongyueluncong.2017.04.012

一、引言

1994 年分税制改革重构了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税收关系,确立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税收收入分享制度。之后,一系列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了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关系,比如 2001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2009 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以及 2012 年开始的“营改增”等。随着政府间税收分享关系的改革和深化,以及转移支付制度的逐渐完善,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税收分享为核心特征的财政分权制度。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在分权模式下,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更有效率地提供公共品^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则主要依赖于中央政府向地方提供转移支付^②。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更侧重审视多级政府间的关系与权责分配,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政府有充足的激励对市场制度进行保护^{③④⑤}。结合到中国的实际,一些研究则强调,经济增长的实现具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在中

[作者简介]张冠甲(1984—),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维刚(1985—),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李军林(1964—),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① Tiebout, C.: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pp. 416—424, 1956.

② Buchanan, J. M.: *An Economic Theory of Clubs*, *Econometrica* 31, pp. 1—14, 1965.

③ Weingast, B.: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 (1), pp. 1—31, 1995.

④ Qian, Y., and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1 (4), pp. 83—92, 1997.

⑤ Qian, Y., and G.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5), pp. 1143—1162, 1998.

国威权体制下,地方官员有充足的激励追求经济增长^{①②③④}。现有研究对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目标追求有不同的设定,比如,认为地方政府追求税收收入最大化^⑤,追求地方居民福利最大化^⑥,或是官员晋升概率最大化^{⑦⑧}。但是,这些研究都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分权制度的确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现有研究发现,在分税制改革之前,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正面影响^⑨,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⑩。张晏和龚六堂将样本年限进行了扩展,同时覆盖到分税制改革前后(1986—2002年),发现分税制改革显著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改革之前,分权对经济增长多为负面影响,改革之后明显转变为正面影响^⑪。沈坤荣和付文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⑫。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改变地区间竞争程度,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张晏和龚六堂发现,存在禀赋差异的地区之间,地方政府会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展开竞争,但在分权机制下,中央政府会采取措施平衡地区间发展,帮扶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地方政府^⑬。第二,改变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例如,改变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水平:贾俊雪等证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公共资本投资事权上的划分程度的变化,会明显改变各地区的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而改变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⑭;或者,改变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效率:郭庆旺和贾俊雪的实证研究发现,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被纳入制度框架,财政支出长期以来的无效率低水平的局面得到了改变,经济增长也因此得到促进^⑮。其他一些实证文献也验证了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⑯⑰}。

财政分权是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抽象概括,单一度量指标不能刻画其全貌。现有研究中常用

①杨其静,聂辉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②杨其静,郑楠《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世界经济》2013年第12期。

③Maskin E., Y. Y. Qian and C. Xu: *Incentive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For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7 (2), pp. 359 - 378 2000.

④Li H. and L.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9 - 10), pp. 1743 - 1762 2005.

⑤Jin Hehui, Y. Y. Qian, and B. R. Weingast: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pp. 1719 - 1742 2005.

⑥Qian Y. and G.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5), pp. 1143 - 1162 1998.

⑦Li H. and L. Zhou: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 (9 - 10), pp. 1743 - 1762 2005.

⑧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⑨Lin Justin Yifu, and Li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Change* 49(1), pp. 1 - 21 2000.

⑩Zhang T. and H. Zou: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pp. 221 - 240 1998.

⑪张晏,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1期。

⑫沈坤荣,付文林《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

⑬张晏,龚六堂《地区差距、要素流动和财政分权》,《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⑭贾俊雪,郭庆旺,刘晓路《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和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⑮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和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

⑯李涛,周业安《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支出竞争和中国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8年第11期。

⑰缪小林,付润民,王婷《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财经研究》2014年第9期。

的财政分权指标有收入分权、支出分权和财政自主性分权等^①;使用不同指标可能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研究结论^②。然而,财政分权作为多级政府间的一种契约关系,核心因素就是税收收入在多级政府之间如何分配。我国现行的分权制度中,中央与省级政府就主要税种间分享比例是固定的,但省级政府与县市政府间的分享细则却鲜有明确的法规规定。因此,各个县级政府实际获得的共享税分享比例差别很大。另一方面,各县域辖区内经济结构的差别,使得县级政府的财税收入对共享税种的依赖程度也并不相同。因此,鲜有研究直接考察税收分享安排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尝试通过现有资料,逆向推算县级政府实际获得的共享税分享比例,并在控制县级政府的财税收入结构的前提下,考察分享比例的变化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研究假说

许多研究表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进入本地辖区,会降低税收努力程度,通过降低实际税率的方式获取资本的青睐^{③④}。因此,地方的经济增长与征税努力程度负相关。同时,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有充足的激励构建良好的投资环境,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⑤。考察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必须分析税收分享对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与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影响。

根据胡祖铨以及刘怡等人的分析,税收分享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会呈现出一种复合的激励效应^{⑥⑦}。当前我国政府税收结构包括中央税、地方税和央地共享税三类^⑧。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由三部分构成:地方税、共享税中地方所得部分,以及预期获得的转移支付。一方面,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提高,能在短期内提高地方财税收入,因此,若共享税种留存于地方政府的比例提高,对征税努力存在一种正向激励;另一方面,出于长期经济增长对招商引资的需求,征税努力的提高不利于地方政府吸引投资,而共享税中地方占有比例的提高,使得地方政府在稍低的征税努力下也能获得原有的财税收入,因此是一种负向激励的表现。至于对地方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影响,现有研究则发现存在正向激励:当地方政府能获得更多的共享税收分成时,则倾向于增加生产性公共支出^⑨。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如图 1 所示:

从理论上无法先验地判断税收分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因为无法确定税收分享如何影响地方政府征税努力。不过,刘怡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若县级政府在共享税税收中占有的比例越高,则实际税收努力程度越低^⑩。因此,这里提出要验证的假设:

县级政府在共享税税收中占有的比例的提高,对县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图 1 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影响作用机制

①Akai, N. and M. Sakata: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2, pp93-108, 2002.

②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

③杨志勇:《国内税收竞争理论:结合我国现实的分析》,《税务研究》2003年第6期。

④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

⑤Weingast, B.: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 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 (1), pp. 1-31, 1995.

⑥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

⑦刘怡、刘维刚:《税收分享对地方征税努力影响》,《财政研究》2015年第3期。

⑧中央税主要包括国内消费税、关税、海关代征消费税和增值税、车辆购置税;地方税包括契税、烟叶税、耕地占用税、车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央地共享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所得税、资源税、印花税等。

⑨刘怡、刘维刚:《税收分享、征税努力和地方支出行为》,《财贸经济》2015年第6期。

⑩刘怡、刘维刚:《税收分享对地方征税努力影响》,《财政研究》2015年第3期。

三、数据、指标选择和模型设定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为《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下文简称《资料》)、《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本文旨在研究税收分享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而2002年之前中央和地方根据企业隶属关系分享企业所得税收入,囿于企业微观数据不足,难以准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所得税分享比例。为了统一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指标,我们只能选取2002年之后的县级数据样本。截至目前,《资料》中仅仅公开了2009年以前的县级财政数据,并且2008、2009两年没有公布县级财政中的税收收入明细资料。因而本文整理使用2002—2007年全国1910个县(市)共11450个面板样本数据。

数据整理过程中我们做了如下调整:(1)以200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调整;(2)数据样本只包含农业县(市),并以2009年全国县级样本为基准剔除在样本数据时间段内发生行政级别变化的县市,比如县升级为区;(3)剔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等直辖市及西藏自治区的数据样本。

(二) 指标设定

经济增长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我们用人均GDP的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沈坤荣等认为教育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需要长期才能实现,故需要加权经济增长数据^①。借鉴其工作,我们使用本年及滞后两年的GDP增长率平均值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税收分享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我们要测算出县级政府在共享税种类的税收收入中占有的比例。采取计算步骤为:(1)确定各地级市中是否有省管县或扩权县,若有,则查找相关文件,确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在县市之间实际分享比例;(2)去除省管县与扩权县后,利用《资料》中各共享税种的县级收入除以本市收入,计算几类共享税种的税收分享比例;(3)按照上述两步,获得分税种的分享比例数据,再进行加权计算,获得一个共享税分享比例。加权计算的公式为:

$$tshare = \sum \frac{t_i}{t_1 + t_2 + \dots + t_n} s_i \quad (1)$$

对于每一个共享税种*i*, s_i 代表该税种的县市分享比例, t_i 代表该税种的县级税收规模。按照这种方式计算的分享比例值tshare越高,则县级政府在共享税种中占有程度越高。

此外,本文还意识到,要准确刻画上述税收分享比例对县级政府的影响,还必须引入相关变量,刻画县级财税收入对共享税种的依赖程度。为此,我们根据《资料》,计算出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自留比例,计算方法为:

$$town = \frac{\sum d_j + \sum t_i}{\sum d_j + \sum t_i / s_i} \quad (2)$$

其中, d_j 代表地方税种,分母部分为当地辖区内所发生的除中央税(如关税等)外所有的税收收入,分子部分为这些税收收入归地方政府拥有的部分,二者比值town则为地方政府的税收留存比例,这一比例值越高,代表地方财税收入对共享税种依赖程度越低。同时,地方政府税收留存比例还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在支出结构上的决策^②,即影响地方财政在生产性公共支出上的投入,因此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是有益的。

此外,我们还控制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影响的其他因素。根据胡祖铨和刘怡等人的研究^{③④},转移

①沈坤荣,付文林《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5年第1期。

②刘怡,刘维刚《税收分享、征税努力和地方支出行为》,《财贸经济》2015年第6期。

③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与地方税收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3年第3期。

④刘怡,刘维刚《转移支付对地方支出规模影响——来自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科学》2015年第2期。

支付对地方政府征税努力具有显著影响。地方征税努力对地方企业行为和绩效及公共支出具有直接影响,此外转移支付也会影响地方均等化公共服务水平和公共支出偏向^{①②}。因此,转移支付是本文一个重要控制变量。我们以地方所接受转移支付占其公共支出的比重刻画转移支付的影响。公共支出和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关于我国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文献^{③④}皆控制了公共支出,故我们亦将公共支出规模作为重要控制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率、劳动力供给以及人力资本供给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也是需要控制的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定义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 GDP 比值,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分别以城镇从业人数和义务教育人数的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市场活跃程度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文献中经常以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值刻画市场开放度。囿于县级数据中缺失进出口总额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指标,我们以刻画国内贸易活跃程度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GDP 的比值来作为市场活跃度的代理变量。此外,我们还以金融活跃度来刻画市场活跃程度,具体以城乡居民存款和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之和与 GDP 的比值作为金融活跃度的代理变量。最后我们还控制县市的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以及产业结构等变量。具体描述性统计如表 1:

表 1 重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增长	人均实际增长	10692	18.0546	1.5359	15.8411	27.1560
共享税税收分享比例(tshare)	见(1)式	10692	0.2568	0.0444	0.0112	0.5185
地方政府税收留存比例(town)	见(2)式	10692	0.4920	0.1184	0.0892	0.9211
公共支出规模	公共支出/GDP	10692	0.1554	0.1215	0.0050	0.9889
转移支付比重	转移支付/公共支出	10692	0.6459	0.1899	0.0763	0.9990
固定投资率	固定资产投资/GDP	10692	0.3999	0.3310	0.0049	17.4085
人力资本	中小学人数/总人口	10692	0.1538	0.0390	0.0116	0.5546
从业人员	城镇从业人员/总人口	10692	0.0625	0.0598	0.00002	0.9528
贸易活跃度	社会零售品总额/GDP	10692	0.3047	0.1669	0.00005	7.1327
人口密度	总人口/行政区域面积	10692	0.0295	0.0273	0.00001	0.3753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10692	0.1856	0.1376	0.0021	1.0000
金融活跃度	(存款+贷款)/GDP	10692	1.1779	0.7298	0.0008	16.4353
第一产业	第一产业增加值/GDP	10692	0.2941	0.1386	0.0072	0.9633
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10692	0.3842	0.1563	0.0240	0.9763

注:(1)本表数据根据各统计年鉴整理,在整理过程中去掉了异常值,比如转移支付占公共支出比重大于 1,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大于 1,第一、二产业占 GDP 比重大于 1 等数据样本;(2)经济增长指标是当年及滞后两年人均实际增长的平均值。

(三) 模型设定

根据数据特征,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税收分享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效应。具体设定如下:

$$y_{it} = \alpha_0 + \alpha_1 tshare_{it} + X_{it}\beta + \mu_i + \nu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y_{it} 表示地方经济增长率; $tshare_{it}$ 即(1)式表示的共享税分享比例; X_{it} 为我们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包含(2)式中计算的 $town$ 、转移支付比重、公共支出规模、金融活跃程度、市场活跃度、规模产值占比和从业人员增长率等; μ_i ν_t 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 ε_{it} 为扰动项。此外,在稳健性检验部分 y_{it} 还表示电话用户安装增长率、居民存款增长率等。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结果汇报

表 2 汇报了主要回归结果,第(1)列结果显示共享税种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激励效应,其系

①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

②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经济研究》2012 年第 5 期。

③张宴、龚六堂《分税制改革、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 年第 1 期。

④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管理世界》2012 年第 6 期。

数值为 0.617 ,并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共享税种税收分享每提高 1% ,人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提高 0.617% 。在第(2)列结果中 ,控制了地方政府税收留存比例后 ,这一系数值依旧显著 ,并且增大至 0.871 。其中地方税收留存比例系数显著为负 ,原因可能在于 ,地方财税收入自给能力的提高 ,会增加地方政府的福利性支出 ,而对生产性支出产生“挤出效应” ,从而削弱了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①。

考虑到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可能存在互为因果性 ,导致估计出现偏误。虽然在经济增长指标设定时我们进行了滞后两期平滑设定 ,但不能排除加权后的当年经济增长依然会影响到地方税收 ,从而反向影响税收分享比例。为排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 ,我们选取固定电话使用户数占当地居民户数比重的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报于表 2 的后两列。结果同样支持前两列的结论。

表 2 还汇报了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影响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公共支出规模、转移支付、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和第二产业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 ,固定投资率、金融活跃度、贸易活跃程度、第一产业占比和从业人员为显著负向效应。固定投资率、金融活跃度和贸易活跃度为固定投资、金融存贷款和国内贸易与 GDP 的比值 ,故其负向效应主要与指标设定有关。此外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显著 ,这可能是指标设定引起。本文中我们使用中小学人数和当地人口比值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一方面人力资本文献中中小学人数只能算初级人力资本 ,其后升学及工作未必留在本地。另一方面 ,中小学人数占比越高越会挤出地方政府对生产性支出的公共支出。因此 ,表 2 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显著是合理的。本文中从业人员定义为城镇职工与乡村从业人员之和 ,而从业人员结构不同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不相同。我们以城镇职工作为从业人员代理变量时 ,结果显示其对经济增长存在

表 2 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经济增长		电话使用增长率	
共享税种税收分享	0.617 *** (0.057)	0.871 *** (0.078)	0.027 *** (0.009)	0.088 *** (0.012)
地方政府税收留存		-0.466 *** (0.097)		-0.111 *** (0.015)
公共支出规模	0.230 *** (0.063)	0.166 ** (0.065)	0.119 *** (0.010)	0.104 *** (0.010)
转移支付比重	0.628 *** (0.078)	0.569 *** (0.078)	0.024 * (0.012)	0.010 (0.012)
固定投资率	-0.124 *** (0.024)	-0.126 *** (0.024)	0.015 *** (0.004)	0.015 *** (0.004)
人力资本	0.102 (0.112)	0.165 (0.113)	-0.079 *** (0.018)	-0.064 *** (0.018)
从业人员	-0.297 ** (0.132)	-0.342 *** (0.132)	0.124 *** (0.021)	0.113 *** (0.021)
贸易活跃度	-0.214 *** (0.053)	-0.208 *** (0.053)	-0.011 (0.008)	-0.010 (0.008)
人口密度	5.891 *** (1.994)	5.821 *** (1.991)	1.312 *** (0.315)	1.296 *** (0.314)
城市化率	0.684 ** (0.306)	0.662 ** (0.305)	0.071 (0.048)	0.066 (0.048)
金融活跃度	-0.212 *** (0.058)	-0.162 *** (0.059)	-0.075 *** (0.009)	-0.063 *** (0.009)
第一产业占比	-2.178 *** (0.283)	-2.104 *** (0.283)	-0.095 ** (0.045)	-0.078 * (0.045)
第二产业占比	1.252 *** (0.235)	1.247 *** (0.235)	0.132 *** (0.037)	0.130 *** (0.037)
常数项	19.122 *** (0.300)	19.041 *** (0.300)	-0.547 *** (0.047)	-0.566 *** (0.047)
观测值	10 692	10 692	10 692	10 692
R 平方	0.066	0.068	0.058	0.063
样本数	1 900	1 900	1 900	1 900

注:1.***, **,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2. 括号中为标准误;3. 回归方法皆为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变量中 ,除人口密度、第一二产业占比外 ,其他控制变量皆取对数值。

①刘怡 ,刘维刚《税收分享、征税努力和地方支出行为》,《财贸经济》2015 年第 6 期。

显著正向效应,故从业人员的负向效应也是合理的。

(二) 稳健性检验

1、调整数据。在分析表 2 时,我们剔除了数值缺失、因数据统计误差造成的转移支付占比和支出规模等超过 100% 的异常值的样本。因此表 2 的回归结果是基于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所得,而我们的回归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故非平衡面板数据可能会导致表 2 的结果并不稳健。基于此,我们将样本数据整理为平衡面板数据,将分析表 2 时 1900 个非平衡面板截面调整为

表 3 平衡面板数据下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经济增长		电话使用增长率	
共享税种税收分享	0.942*** (0.077)	1.378*** (0.100)	-0.004 (0.011)	0.063*** (0.014)
地方政府税收留存		-0.780*** (0.116)		-0.121*** (0.016)
观测值	8 682	8 682	8 682	8 682
R-方	0.080	0.086	0.073	0.080
截面数	1 447	1 447	1 447	1 447

注:同表 2。

表 4 税收分享对新选择经济增长代理变量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人均居民存款增长率			
共享税种税收分享	-0.005 (0.013)	0.193*** (0.017)	-0.058*** (0.016)	0.182*** (0.021)
地方政府税收留存		-0.364*** (0.021)		-0.427*** (0.024)
观测值	10 691	10 691	8 681	8 681
R-方	0.476	0.494	0.467	0.490
截面数	1 900	1 900	1 447	1 447

注:同表 2。

1447 个平衡截面样本,观测值由 10692 调整为 8682 个。基于平衡面板样本,我们重新回归了表 2,结果汇报如表 3。结果显示,因剔除异常值所造成的面板数据非平衡性并未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调整经济增长代理变量。表 2 中我们使用了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电话使用增长率作为代理变量,此处选择居民存款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率的代理变量。根据样本数据,居民存款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协相关系数为 0.2851,可以认为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4,结果发现主要结果依然稳健。此外,我们还通过混合效应回归分析了税收分享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结论与表 2 基本一致^①。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税收分享反映了地方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财政关系,分享规则的变化体现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变化。我们以税收分享的角度分析了政府间财政关系变化对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效应,并利用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在共享税中占有比例的提高,能有效促进地方的经济增长。

中国模式的成功,曾一度被归功于县域竞争所激发的活力^②。县级政府在招商引资、土地出让等方面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此产生的恶性竞争、土地财政等现象也引发了学界的关注与担忧。本文研究结论对我国税制改革和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积极的政策含义:重建地方税体系的财政改革须将税收分享的影响纳入效应评估体系中。地方税体系的重建将会直接影响地方税收分享规则的安排,进而变更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约束,影响其对发展政策的权衡与选择。全面评估税收分享规则变化对地方经济的刺激效应,将有助于优化税收制度的设计,促进地方优化经济增长的方式。

[责任编辑:王成利]

①限于篇幅这里不再列出回归结果。
②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